

- ◆ 战略热点
- ◆ 改革热点
- ◆ 发展热点
- ◆ 政策热点
- ◆ 理论热点
- ◆ 产业热点
- ◆ 形势热点
- ◆ 公众热点
- ◆ 市场热点

中国 九大热点

◎ 陈 淮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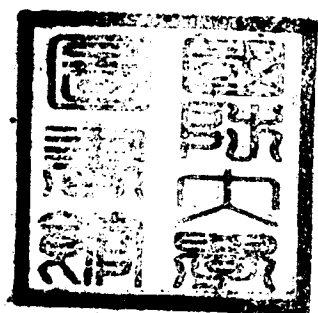
· 中国发展出版社 ·
DEVELOPMENT



国防大学 2 071 2409 3

中国九大热点

陈淮 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九大热点/陈淮著.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0.9

ISBN 7-80087-382-X

I. 中… II. 陈… III. 经济-研究-中国-文集
IV. F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0051 号

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赵登禹路金明胡同 8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电话: 66180781

北京地质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1/32 850 × 1168mm 印张: 7.125

字数: 166 千字 印数: 1—8000 册

定价: 13.80 元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差错, 可向发行部调换

战略热点

- 3 增长问题要纳入中长期战略的视野
- 8 可持续发展：挑战与危机
- 14 要认识国民经济运行风险的长期性
- 20 我国能源结构面临战略调整

改革热点

- 29 国有经济改组要有比“三年”更远的战略安排
- 34 市场化：根本战略措施在于调整社会利益结构
- 40 “人世”对中国商贸的挑战
- 45 从国有企业到国有资本

发展热点

- 53 中西部的发展难度可能正在增大
- 59 老工业基地脱困改造政策要防止“走偏”



65 产业化：科教兴国与知识经济

71 中国投资需求的潜力何在

77 中国消费需求的潜力何在

政策热点

85 分收入阶层启动消费

90 用财政贴息启动固定资产投资需求的政策

建议

96 就业政策的目标选择与主要政策思路

102 运用价格杠杆扭转价格形势

108 尽快制定基础产业的“资产重组指导意见”

114 消费政策：你需要反思

119 应对通缩：财政出招还有潜力

理论热点

125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

131 善待资本者



- 137 “职工持股”能走多远
143 关于“转变消费观念”的深层次思考

产业热点

- 151 “入世”挑战中国产业
157 产业发展要重在结构调整
162 钢铁工业结构调整事关大局
167 传统产业发展与老工业基地改造

形势热点

- 175 1999：我们面对通货紧缩
181 短期调控政策确有中期化趋势
187 物价：正增长1%意味着什么
192 危机不属于中国

公众热点

- 201 中国为什么需要利息税



- 207 降息：积极作用与风险并存
- 210 对利息收入征税可采取对低收入者的保护措施
- 212 储蓄实名制：挑战传统观念

市场热点

- 217 消费者：“入世”意味着什么
- 222 请注意市场信号：也许这次不寻常

战略热点



增长问题要纳入中长期战略的视野

1996年，中国“九五”计划和2010年的十五年远景目标规划提出。由于当时对增长速度问题的估计较为乐观，这一中长期战略强调，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关键之一。现在看来，中国中长期发展的增长动力问题并未完全解决。1998年政府提出要确保增长8%。这个政策目标的意义实际上远超出短期宏观调控的范围，已关系到国民经济在跨世纪发展过程中能否继续保持高涨、繁荣局面和宏观长期向好。

一、增长动力不足的隐患已经潜在

从1981年至1996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其中1993~1997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1%。在此期间，中国政策调控的目标主要是抑制过热，经济扩张的增长动力似乎总是自然存在的。这一认识以及当时“21世纪亚洲将是世界经济火车头”的乐观估计，掩盖了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已经大量积累的诸多矛盾和不利因素。

在从80年代初期以来的“翻两番”战略发展过程中，中国国民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持续增长，主要支持因素是以下若干方面。一是在农村经济关系调整推动下产量一度大幅提高的农业和在“六优先”政策支持下大发展的轻纺工业。“六五”期间，是轻纺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带动国民经济走出了“第二次大调整”的谷底，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从1981年的4.4%提高到1985



年的 12.8%。二是在对“瓶颈”产业政策扶持下迅速扩张的基础原材料工业。中国的钢产量从 1980 年的 3712 万吨提高到 1997 年的 10757 万吨，17 年间实际产量增长了 190%。三是受惠于“七五”期间贯彻实施的“梯度发展战略”和其他改革措施发展起来的“特区经济”与东南沿海区域经济。其中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在 1986 年至 1993 年间每年增长速度达 25%~30%。四是从“七五”开始“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到 1990 年底时，中国乡镇企业个数达到 1850.40 万个，企业总产值占全社会总产值比重达到 22.27%，固定资产原值达到 2202 亿元。五是“八五”期间外向型经济的快速拉动。1995 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 40.33%，当年贸易顺差达 166.9 亿美元，“八五”期间实际利用外资额累计为“七五”同指标的 3.48 倍。六是伴随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从几乎空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家电产业。中国目前的冰箱、洗衣机、彩电生产能力和实际产量已均居世界第一位。但到“九五”初期，上述增长支持因素，由于已经过不断挖掘潜力，对新的增长过程的支持能力或则已相继弱化甚至消退，或则需要调整与再积蓄力量。从深层次说，已经潜在增长动力不足的隐患。

“九五”并非对新的增长支持因素没有安排。但在 1996 和 1997 年，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除“软着陆”的短期宏观调控外，汽车与房地产等新支柱产业成长、规模经济与集中化、股市大规模扩容、通过“破产兼并”帮助国有企业摆脱债务负担等战略措施大多未能实现预期的目标。此时，远比短期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方面的缺陷更为深刻的增长危机已经在深层次形成。

1997 年年中，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与此同时，各种内外矛盾的积累正在使中国原有战略的许多内在缺陷集中地暴露出来。1998 年，中国国民经济面临的是国际环境、外贸、引进外资、



支柱产业、乡镇企业、特区经济、消费市场等几乎所有增长支持因素的前景均不乐观的增长形势。显然，我们需要讨论的已不仅仅是1998年能否确保8%，而是国民经济能否避免走向衰退，实现长期繁荣、稳定。

二、中长期发展关键是要找到新的增长动力

当前，一些专家已将增长问题纳入了中长期战略研究的视野，目前的探索主要集中为三个方面：一是中国能否突破“20年连续高速增长极限”的国际经验；二是在中长期发展过程中，中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良性波动期间是否应控制在7%~12%；三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格局是否已出现了从“通货膨胀拉动”转变为“通货紧缩压抑”，是否已进入“次高增长”阶段。人们已经注意到，我们不可能仅仅依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短期政策来实现中长期战略目标。

实现中长期战略发展过程的增长，关键是要找到新的增长动力，即人们常说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跨世纪战略发展过程中，支持中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何在？发展高科技产业和知识经济是动力，大力开拓新兴产业是动力，继续推进外向型经济扩张是动力。但从中国所处发展阶段判断，根本的动力在于以下四个方面。

1. 新一轮生产手段的彻底改造。工业化过程，最根本的发展任务是用机器取代手工劳动，对经济增长的最根本推动力量是生产手段的彻底改造。应当大声呼吁，中国还远没有走完生产手段改造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1998年抗洪抢险的电视画面可以清楚地说明我们才在手工劳动基础上走出了多远；中国吨钢综合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0.2~0.3吨，1亿吨钢多耗的能源要占到中国能源总消耗量的2%，占到钢铁工业能源总消耗量的20%左右，这个事实显示出与钢铁大国和钢铁强国的距离还有多大。在



“翻两番”战略中，由于资金与成本限制，中国许多产业发展较多地采取了倚重初级技术、适用技术的技术构成选择，主要表现为大量引进二手设备、接替发达国家淘汰产业、“三来一补”推动下的劳动密集型组装业发展等。当前，一方面这种低度化的技术构成已明显成为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不强的基本原因；另一方面，“21世纪谁来武装中国”的问题已经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当我们借鉴“罗斯福新政”的时候应当注意到，从根本上带动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走出“过剩危机”的是产业固定资产的大规模更新。可以说，在中国重要基础产业实施固定资产大规模更新战略正当其时。

2. 竞争主导下的资源优化配置。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本质含义，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关系调整；另一方面是依据效率、效益对资源实行优化配置。资源优化配置是竞争的结果。在跨世纪战略发展过程中，资源优化配置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将主要产生于三个方面：一是区域结构调整和区域间分工关系重组；二是利用规模经济过程中的集中化；三是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和多种所有制发展过程中国民财富利用效率的不断提高。

3. 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整治。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明显地走到了这样一个阶段：生产领域的效益提高已极大地依赖于外部环境条件的改善。由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外部性”的低效率不仅使追加投入的边际效益急剧下降，而且也严重抵消了企业内部设备与管理改进的作用，使存量资产的利用效率也不断趋于下降。跨世纪战略发展过程中的基础设施整治是一个包括交通与通讯条件改善、城市建设、环境保护、灾害防避等多方面内容的广义范围。可以预期，基础设施大规模整治过程将不仅是巨大投资需求的产生过程，而且将是存量资产的利用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城市化取得实质性进展的过程，社会分工关系不断优化重组



的过程。

4. 消费结构良性化过程中的需求拉动。跨世纪战略发展过程与“翻两番”发展过程的一个明显区别是，供求关系的常态已经从供不应求转变为供大于求，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已经从生产领域转移到了流通与消费领域。1998年，当经济为“过剩”所困扰，增长受到需求不足的抑制时，刺激消费成为了政策的主要指向之一。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消费结构不合理。而消费结构不合理的原因在于改革滞后。前期的改革过程较多地侧重于调整人们与生产资料结合过程中的经济关系，例如“多劳多得”、“承包”、“劳动合同制”、“竞争择业与下岗”、“按要素分配”等；但对生活福利范围内的体制关系则几乎未深入涉及，例如迄今福利分房制度仍未真正终止。从长远看，扩大消费需求的关键点不在于降息以使人们觉得储蓄无利可图，不在于鼓励人们购买更多的食品、衣物，甚至也不在于空调或VCD等新型家用电器是否能形成新的消费热点，而在于人们在传统的以衣、食为主的消费支出之外，把原有体制下一般非个人承担的行、住、医疗、教育、养老、家庭意外风险防范等方面支出纳入个人的消费构成。随着改革的深化和人们对体制性福利的期望逐步降低直至消除，消费结构良性化过程中产生的需求拉动将成为国民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拉动力量之一。

1998年11月



可持续发展：挑战与危机

一、没有比人类的共同前途与命运更为重要的了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跨入新世纪过程中面临的共同课题。从 90 年代初起，可持续发展在我国的中长期战略中的地位不断提高。1994 年 3 月，《中国 21 世纪议程——中国 21 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被提交国务院第 16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这份与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 1992 年通过的《21 世纪议程》相呼应、正式代表中国政府态度的重要文件庄重指出：“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中国在未来和下一世纪发展的自身需要和必然选择”；“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影响着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以致每一个人”；“中国的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环境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深知自己在保护地球生态环境方面的责任和可以发挥的作用”。还有比人类的共同前途与命运更重要的事情吗？没有。可以说，这份文件已经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作出了最高的概括。

“九五”和 2010 年远景目标规划中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具体安排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国土资源的保护和开发，提出要“依法保护并合理开发土地、水、森林、草原、矿产和海洋，完善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价格体系，逐步建立资源更新的经济机制，加强土地管理”。二是环境和生态保护，提出要“坚持经济建设、城乡建设与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所



有建设项目都要有环境保护的规划和要求；搞好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增强全民环保意识；创造条件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健全环境保护的管理体系和法规体系；2000年，力争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剧的趋势得到基本控制，部分城市和环境的质量有所改善”。

请注意，“九五”和2010年远景目标规划有两个特点，一是力图通过利用市场机制的方法改善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状况，二是在中期范围内把可持续发展的重点首先放在城市建设和工业污染治理上。实践发展证明，这一战略设想的认识存在重大缺陷。

二、原有战略对可持续发展的迫切性估计不足

“九五”和2010年远景目标规划最重要的缺陷在于对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迫切性明显估计不充分。1997年的黄河超长期断流、1998年全国性的特大洪灾以及渤海赤潮等环境变异清楚地警示人们，用“刻不容缓”、“迫在眉睫”来形容我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严峻形势已经毫不为过。深刻的教训已经使实施战略调整、采取断然措施的必要性不容置疑。在这种形势下，单纯“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设想显然已不能满足紧迫需要，依靠行政性、法律性强制手段的黄河上中游用水限期缩减50%、森林资源“全面禁伐”、对环境有明显破坏作用的资源采掘实施“禁采”等措施陆续出台。重要江河整治、水土保持等成为了从最高决策层到边远落后地区贫困人群共同关注的焦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点出现了从重要江河的下游地区向上、中游地区推移的趋势。在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中，出现了经济发展、工业化进程，甚至脱贫、“奔小康”战略都要更多地让位于环境的趋势。

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是不是我们对1997年到1998年的自然变异反应过度？不是。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



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人与自然、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比任何国家都要尖锐。认识我国可持续发展形势的严峻性、紧迫性，有必要特别强调两个特殊性。一是历史。如果说，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始端于工业文明的出现，那么在我国，人类活动对可持续性发展条件的破坏早在农业文明推进过程中就已经大规模开始。在特定生产力条件下，超过土地承载力的人口繁衍造成了几千年来对土地、对环境的反复过度索取，造成了黄土高原的植被破坏，造成了对长江中下游众多河流、湖泊水系的不断围垦，造成了长江中上游地区人口超高密度聚集和林木资源不断消失，造成了西北地区沙化侵袭的普遍存在。可以说，我们要还的环境“债”可迁延上溯的时间要比世界上其他国家长得多。二是现实。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一般保持同步。但在我国，城市化进程长期滞后于工业化，建国后的前 30 余年，工业生产力主要向少数超大型城市聚集；改革开放以来的近 20 年，大量乡村工业遍地开花。城市化进程缓慢和城市结构的严重不合理使我国克服工业文明负面影响的难度要比其他工业化国家大得多。大城市工业治理、中小城市工业治理、分布极广的乡村工业治理，我们面临的重点是难度最大的两头。正是由于上述特殊性，如果我国的中长期发展战略中不能对可持续发展的迫切性作出充分认识，那么在 21 世纪，环境代价将可能以几何级数的速率迅速扩大到我们无法承受的地步。

三、要从广义范围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

“九五”和 2010 年远景目标规划设想，到 2000 年，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力争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剧的趋势得到基本控制，部分城市和环境的质量有所改善”。现在看来，这一目标涵盖的范围远不充分。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实现经济、社会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协